

六次危机

〔美〕R. M. 尼克松 著

六 次 危 机

上 册

〔美〕 R. M. 尼克松 著

北京 大学法律系 《六次危机》翻译组译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 年 • 北京

Richard M. Nixon

SIX CRISE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2

内部读物

六次危机

(上、下册)

[美] R. M. 尼克松著

北京大学法律系 《六次危机》翻译组译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7/16 字数 400 千字

1972 年 1 月初版 197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统一书号: 3017·131 定价: 2.40 元

出 版 说 明

《六次危机》一书是尼克松于1960年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失败之后写的，1962年出版。这本书是尼克松反动政治生涯的回忆录。他在书中讲述自己和美国经历的六个“紧要关头”，也就是他所谓的六次危机。书中自称他如何“深思熟虑”和“果敢行事”，并竭力渲染他对付所谓“危机”要有“充分准备”，要“沉着冷静”，要“无所畏惧”，要“积累”反共反人民的“经验”等一套反革命哲学。书中还暴露了美苏两国的勾结与争夺、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以及美国的所谓“两党制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鉴于此书对了解尼克松本人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一定参考价值，特译出，内部发行，供有关单位参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希斯案件	10
第二章 基金问题	115
第三章 心脏病侵袭	200
第四章 加拉加斯	276
第五章 赫鲁晓夫	353
第六章 1960 年竞选运动	438
附 录 理查德·尼克松的三次公开演说	
一、1958 年 11 月 26 日在英国伦敦市政厅英联邦 英语国家联合会上的演说	650
二、1959 年 8 月 1 日在莫斯科的电视广播演说	660
(附: 1959 年 8 月 2 日在莫斯科斯帕索大厦 的记者招待会)	
三、1960 年 7 月 28 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接受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	683

绪 论

1960年的选举后，有一件事是我最不想做或最不希望做的，那就是写一本书。我收到过要出版我的回忆录的通常稿约，这种稿约都是向那些已经自动或被迫退职的政治领袖们提出来的。但是，纵使任何一个经过一次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在运动以后马上感到他已经活够了一生，我仍然不以为我已经到了一生中写回忆录的时刻。由于我从不写日记，所以我就甚至写不出一份关于我当副总统八年的详细记载来。有三个人特别影响我转变了这个想法。

选举后不久，在白宫的一次晚餐席上，我荣幸地坐在艾森豪威尔夫人的旁边。我告诉她我决定不写书的一个理由，我相信，只有总统才能够写得出他的政府的经历，而且比较起来，其他任何叙述都将是不完善的和乏味的。她回答说，“但是有些动人的事件，象你的南美和俄国之行，只有你才能讲得出来，而且我认为，人们在读你所叙述的那些真实情况时，是会感到兴趣的。”

4月间，我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第一次会见他。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参加“学者文人”的行列（他自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员）的可能性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意见：

每个政治活动家，应该在他一生中某个时刻写一本书；既是为了精神锻炼，也便于提高他的公众威望到达一个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的地位。

对我的决心影响最大的是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从我 1947 年作为国会议员进入政治生涯的时候起，她就是我一个知友和顾问。几年来，她一直坚持要我抽出时间来写一本书。直到 1961 年 1 月 20 日，我总是可以因事情繁忙来进行解释。当我离开华盛顿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她亲自管起这件事情来了。4 月间，她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道布尔德公司的肯·麦考密克正飞往加州，定于第二天来看我。和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推说似乎没有一个值得我写的题目。她的回答是“你让肯·麦考密克去决定吧”。

在麦考密克到达的前一晚，我企图把一些可以作为讨论基础的意见记下来。我肯定这样一点，我曾经有过好的(或不好的)运气，在一些规模远远超出个人范围的危机局势中成为中心人物，这就使我的经历同其他政治活动家的经历大不相同。我就十几个这样的局势作了笔记，然后挑选了其中六个(即这本书各章的标题)，以便介绍给麦考密克。他赞成这个想法；他告诉我，我会发现写一本书是多么容易而又是一种享受，他最后使我信服，我应当冒这样的险。

这次冒险结果成了我一生中第七次重大危机。从所包括的精神锻炼的观点来看，它是最最困难的。我对那

些著书立说的人本来就很尊重，这种尊重现在更不知增强了多少倍。但是，关于我个人对将来再从事任何这种工作所抱的态度，用我所欣赏的一个艾森豪威尔的笑话或许能最恰当地描述出来。

194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戒了烟。有一次，我问他会不会再引起烟瘾。他回答“不会，”并接着说：“我不敢说我不会再抽烟，但是，我肯定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我决不再戒烟！”我对于写书的态度大体也是如此：我或许会再写一本书，但我肯定，我决不会把它写完的！

关于这本书写些什么(或试图写些什么)，不写些什么，我想再说几句。

我并不打算把围绕每个危机局势的所有事件都完全地和详尽地加以叙述。我力图描写我对每次危机的个人反应，然后从我的经验中抽出一些关于“危机并发症”的一般原则来。

另一方面，我不想妄称这是一部论述处理危机的学术论著。为了达到更好地了解那种引人入胜和十分重要的主题的目的，我的见解可能作出什么贡献，不能不留待专家们来判断。

西北大学两位政治学家詹姆斯·A. 鲁宾逊和托马斯·W. 米尔本，目前正从事危机行为的研究。他们写给我的一封信，使我确实相信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种种局限性。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我试图回答的有下列问题：

在危机局势中，究竟有没有可能合乎理智？你能不能把感情反应同真正事实的和经验的事情区别开来？

危机似乎有许多共同的因素吗？

参与者似乎从每次危机中得到教训吗？

对于你正在写的六次危机的全部或其中一次，你是不是有一种兴奋或享受的感觉？

你是否觉得你已体会到有关你个性中的基本力量的任何新东西？或者你是否发现过你以前没有察觉的任何个人弱点？

你是否发现，当面临一次危机时，你有自己未曾估计的额外力量？

你能否在危机过去后恢复你的感情？有没有从紧张或焦虑中得以松一口气的任何感觉？

经过这几次危机，你是不是形成了任何“经验规则”，来指导你在以后危机局势中的行为？

有些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但是，让我强调，是从个人的观点而不是从一般的观点来回答。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有一个教训看来特别明显：对危机的反应，有赖于个人（他个人的品格和性格的特点，他所受的训练，他的道德和宗教的背景，他的能力和弱点）对局势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危机的反应是纯属于个人的东西。

我的属于个人方面的结论，将比较详细地全部写在下面的篇幅里，现将其中一些阐述如下：

这六次危机有一个共同因素，就是每次危机固然是一个尖锐的属于个人的问题，但也包含着完全超越我个人运气的更广泛得多的后果。一方面，公众对危机的关注远比个人考虑多得多这个事实，使危机更加难以忍受。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因素可以成为一种有利的因素。我们常常听说，真正的“大”人物，在处理大事中大显身手，而当他们遇到小麻烦（换句话说，遇到纯属个人的危机）时，就会踌躇和失败。

根据我的经验，问题愈大，其后果愈广泛，一个人考虑自己就愈少。他不得不以他的全部注意力专心致力于他所遇到的大得多的问题。“忘我”是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所能够有的最大财产。“自私”（照严格的字面意义而不是照一般的意义）是最大负担。危机超出了一个人自身的范围这一事实，使得他没有心思来考虑自己的问题。在发生危机时，自然的紧张症状不会成为由于忧虑自己而造成的自我毁灭，恰恰相反，这种症状能够积极地推动创造性的行动。

第二个一般要领，最好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在1958年我从南美回来后不久，我参加了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勋章获得者招待会。一位荣获勋章的客人到我跟前，指着他的绶带说，“你应该佩带这个，我不配。要是我处

在你的地位，我作不到你在加拉加斯所作的一切。”我回答说，“要是我是你，我也作不到你在布尔格战争中所作的事。”也许我们两个都错了。没有一个人，在受到可能非他所能控制的事件的充分考验之前，真正知道他能够胜任什么。此所以这本书不是对大人物的评价，而是关于重大事件的叙述——以及一个人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反应。

举例说，我不相信在处理危机局势时，有些人“生来”就冷静、勇敢和果断，而其他的人则不这样，象有一句流行的老话所说的“他躯壳内没有神经”。自然，有些人可能比别人坚强些，沉着些，敏捷些，精明些，勇敢些。但是我想，这些特性多半是后天的，不是天赋的，而且往往是在紧张时忽然获得的。公众喜欢迷信他们的领袖，很多领袖也喜欢迷信他们自己。我们倾向于把一些人视为“生来的领袖”。然而，我觉得领袖们也受所有人类弱点的支配：他们发脾气，变得意气沮丧，感受其他的精神紧张症状。有时，甚至坚强的人也会哭起来。

最后，我很想列举从这本书所描述的六次危机中我所吸取的一些教训。我提出它们来，并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变的规则，而只是把它们当做试验性的指针。

在危机中抱有自信，大都依赖于在有可能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作好足够的准备。

在战斗中保持冷静——或许用“沉着”这个词更合适

——是信念的产物。而信念，除来源于宗教传统和道德修养外，是在一个人经过踌躇、疑虑和心神不定这个必然的阶段而且确信他的事业是正当的并决心战斗到底之后，才产生的。

勇敢——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无所畏惧——是锻炼的结果。任何人要是自称从来不知畏惧，那是撒谎，不然，他就是傻瓜。但是，通过一个有决心的行动，他就不会再去考虑那些造成畏惧的理由，从而集中全部精力去赢得战斗。

经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一个人那怕只经历了一次较小的危机，他也会学到：当他肌肉紧张、呼吸急促、神经兴奋、肚子难受、脾气暴躁、长夜不眠的时候，切勿担忧。他认识到，这种症状是他为要投入战斗而全身紧张起来的自然而健康的预兆。发生这种现象，无须乎担忧，不发生这种现象，倒是应该担忧的。因为他体验到，只要一参加战斗，所有这些症状将全部消失——除非他坚持主要地考虑他自己，而不去考虑他必然遭遇到的问题。

一个人将期望战斗结局的到来。他想，“只要战斗一过去，我将感到痛快”。但是，如果战斗以胜利结束，他除了一段短时期的兴奋外，将开始深切地感受他所经历的全部情况。他甚至可能感到身体上难受和精神上沮丧。当然，发生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他在感情上、身体上和精神上太筋疲力尽了，以至不能享受他如此热切地期望过的

胜利果实。

每一次危机局势，其中最痛快的时刻实际上是战斗本身。最困难的是犹豫不决的关头——斗争还是逃跑。而最危险的时刻则是危机后的余波。正是这时候，一个人筋疲力竭，警惕松懈，必须谨防作出迟钝的反应和错误的判断。

一个人“欣赏”危机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不好回答。从危机是“娱乐”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确不欣赏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几次危机。然而，生活确实不单纯是寻求普通意义上的享受。我们都总是想袖手旁观，过较为单纯的生活，集中全力使生活更闲散些、活得更长些并留下更多的财产。但是，应付危机必需创造力。它要求发挥一个人的全部才能。当他回顾一生时，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否达到了尽力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的预期标准？或者是不是仅仅使用了他的部分才能？

一个人可能遇到别人没有遇到的机会。但是，真正算数的是这个人是否利用了他的一切良机。当危险处于可能完全胜利或者彻底失败时，他是否不惜冒一切风险？在超越个人和家庭考虑的事件中，他是否断然去寻求机会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在一次超出个人利害的事件中，一个从不肯丢掉自己的人，丢掉的是一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只有丢掉自己，才能找到自己。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发掘出他从未觉察的全部潜在力量，否则，这种力量就会全被埋没。

危机的确引起苦恼。但它是这样一种极大的苦恼：一个人可能不愿再去体验它，然而决不愿意错过了它。

我们既然生活在个人对危机的反应可能影响未来多少世纪的人类命运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必须不惜全力以赴地去学会我们能够学会的一切，并这样来磨炼我们的反应能力。如果一个人应付危机的经验记载（包括他的失败和成功）对这方面能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这本书说不定可以适合这一有益的目的。

第一章 希斯案件

在危机中保持冷静、自信和果断的能力，并不是一种天生的特征，而是一个人如何准备好参加战斗的直接结果。

“如果不是由于希斯案件，你就会当选美国总统。”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在 1960 年选举后作出了这个结论。

可是另一位好朋友却同样真诚地跟我讲：“如果不是由于希斯案件，你永远也不会成为美国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这两位朋友都可能说得对。

希斯案件是我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危机。我的名字、声誉和事业都始终和我在 1948 年作为一个三十五岁的初次当选的众议员在这个案件中所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可是，有一天当我正在同我的十五岁的女儿特丽西娅讲到我这本书所包括的内容时，她打断我问道：“什么是希斯案件？”

我第一次认识到，正在成长中的整个新一代美国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希斯案件。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我自己这一代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十二年前这场震动全

国的激动感情的争论的事实和含义。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叙述事情的始末。我将在这些篇幅中试图把它如同我体验到的那样讲出来——不仅作为一次尖锐的个人危机，而且作为对当代这个不断继续着的危机中一次生动的案例研究，只要侵略性的国际共产主义仍然在世界上放肆，我们就会面临这一危机。

就我本人讲，希斯案件开始于1948年8月3日星期二华盛顿的一个闷热的上午，在众议院新办公大楼的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听讯室中。戴维·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就共产党渗入联邦政府出席作证。在这个委员会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比这次更轰动的调查是由比这个更不引人注意的证人搞起来的。

钱伯斯并没有要求出席这个委员会作证，以便把阿尔杰·希斯特别挑出来加以攻击，这和围绕这一案件后来发展起来的神话差不多一样离奇。委员会在寻找有可能证实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证言的证人时曾传讯过他。本特利女士在三天以前曾引起了一场轰动，当时她提出了三十二个政府官员的名字，据她说他们曾经提供给她经过分类的文件，而她作为苏联间谍网的一个通讯员，就将它们缩小摄影，交给纽约的俄国间谍以便转送莫斯科。本特利女士提出的那些人都曾经被这个委员会传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以作答将自陷罪责为根据而拒不回答问题。其他的人则断然否认曾协助过任何间谍网。罪状是

重大而又轰动一时的，但没有充分事实根据。

我们后来从别的线索中了解到，惠特克·钱伯斯，《时代》杂志的一名高级编辑，在三十年代曾经是共产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就传他于8月3日来作证。公开听讯以前在委员会办公室中举行的一次简短的秘密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钱伯斯。无论在外表上和在他要说的方面，他给了我或委员会其他成员以很浅的印象。他身材矮胖，衣服也没有烫平，衬衣的领子翻在外衣上面。他以一种相当讨厌的单音调说话。一开始，他仿佛是一个毫不在意（如果不是不大高兴）的证人。但是他对我们在秘密会上向他提出一些问题的答复，使我们相信他并不是一个怪人，所以我们决定，为了节省时间，立刻举行公开听讯会。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证言将是特别重要的。我记得我曾一度考虑过完全省略公开听讯的可能性，以便我可以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发出若干信件。

当钱伯斯开始公开作证时，听讯室中的人寥寥无几。旁听席上只有不满三分之一的人，到场的新闻记者们也只是那些定期报道委员会活动的人。扩音系统出了毛病，钱伯斯必须不断地被提醒提高他的嗓门，以便使委员会成员和新闻记者们能听出他在讲些什么。他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开始以一种相当超然的方式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陈述，仿佛他要做一桩不中意的零活，而希望尽快地脱手。当他懒洋洋地往下念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思想飘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在他还未把书面陈述念完